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上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成果选编

2011

beijingshizhexueshehuikexue
yanjiujidichengguoxuanbian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专项资助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成果选编 2011



beijingshizhexueshehuikexue
yanjiujidichengguoxuanbian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成果选编. 201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656-0360-0

I. ①北… II. ①北… ②北… ③北… III. ①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成果—汇编—北京市—2011 IV. ①C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913 号

BEIJINGSHI ZHEXUE SHEHUI KEXUE YANJIU JIDI CHENGGUO XUANBIAN
2011(SHANG)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成果选编 2011(上)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编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10 千

定 价 11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编 委 会

主 任

王祥武 付志峰

副主任

李建平 赵 清 刘 娟 赵胤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车庆珍 王祥武 王 鹏 付志峰

刘 军 邬岩伟 刘 娟 肖士兵

张庆玺 李建平 赵胤惠 赵 清

执行主编

王祥武 李建平 刘 娟

前 言

截至 2010 年底，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在首都高校建立了 37 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市社科规划办单独在市属单位建立了 11 个研究基地，研究基地的规模已发展至 48 个。七年来，研究基地充分借助依托单位的学科优势，整合学术资源，搭建科研平台，开展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成果。

为加大成果宣传推广力度，展示各研究基地在开展项目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及时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市社科规划办和市教委每年编辑出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成果选编》，至今已坚持 4 年。

今年，本书共收录了 40 个研究基地的 69 篇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研究基地承担的国家级项目 8 篇；市属规划项目 30 篇；基地自设项目 24 篇；横向课题 7 篇。这些研究成果内容基本涵盖了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主要领域，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其中有的成果已经发表于核心期刊，引起了政府和决策部门的重视；有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不同层级的奖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我们希望各研究基地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能紧紧围绕国家和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目标，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提炼研究题材，创造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首都科学发展发挥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作用。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提交研究成果的社科研究工作者和各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尤其是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2011 年 3 月

目 录

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北京大学）

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架的现实选择	/3
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驱动机制	/13

人文北京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

从奥运城市到世界城市	/31
------------------	-----

应急管理研究基地（清华大学）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演变	/47
-------------------	-----

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研究基地（北京工业大学）

复杂网络理论在物流网络研究中的应用	/53
一种保证服务可用性的服务发现模型研究	/61

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品牌个性维度构建	/71
北京回族服饰文化研究	/84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城市建设对北京文化生态发展的新要求	/99
北京地区文学奖励的现状调研及思考	/109

北京创新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民族精神教育相结合五个维度	/125
关于公民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132

北京体育赛事管理与营销研究基地（首都体育学院）

- 社区草根体育组织：生存境遇及未来发展 /141
- 北京奥运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151

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 基于利益相关者识别的中国饭店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研究 /163
- 2009 年度“北京市国民时间使用调查”（BTUS）年度锁链报告 ... /175

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

- 精准广告政策准入研究 /201
- CMMB 手持电视用户行为研究 /217

北京财经研究基地（中央财经大学）

- 北京市民生服务财政支持问题研究 /239
- 北京市发展碳金融的策略建议 /250

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全球港机龙头振华重工国际化快速发展研究 /263
- 2009 年我国企业出口 100 强排行榜评析报告 /280

北京现代物流研究基地（北京物资学院）

- 京津冀物流体系构建的经济环境研究 /295

CBD 发展研究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 楼宇经济：特点、成因与发展模式 /309

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321
- 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329

北京影视艺术研究基地（北京电影学院）

2009 年度中国电影声音艺术创作回眸	/345
---------------------------	------

北京学研究基地（北京联合大学）

加强地方文化中的文化态度层面研究

——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	/361
--------------------	------

基于租金的北京城市办公活动经济空间结构解析	/367
-----------------------------	------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论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制度、方法	/379
-------------------------	------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实践	/386
---------------------	------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基地（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市轨道交通司机安全性评价与管理研究	/397
---------------------------	------

首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基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的学生兴趣培养

——基于全国 8 个省市中学的调研与比较分析	/413
------------------------------	------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北京高校定位研究	/425
------------------------	------



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

基地名称：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

依托单位：北京大学

项目类别：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架的现实选择^①

长期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的存在分歧。双方既坚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又相互借鉴对方的分析方法。尽管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和巴罗(Robert J. Barro)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始终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在理论界获得很大程度的认可，但在实践中，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主张的运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成为各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最重要政策依据。为进一步巩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根本论点，新凯恩斯主义学者也接纳了“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的观点，不断完善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微观理论基础。

深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框架，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新凯恩斯主义一般均衡模型，选取更具有代表意义的效用函数形式，并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对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架设计进行了论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分析框架的形成

各国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一直分歧较大。新古典学派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始终抱有怀疑态度。首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就对预期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疑问。Sargent和Wallace(1975)等人从多重均衡和价格决定的不唯一性等角度，论证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其次，卢卡斯(1972)发现，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才会对实际经济产生短期的影响。另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也认为，实际经济波动与名义变量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因此，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基本上没有影响(Kydland & Prescott, 1982; Long & Plosser, 1983)。上述理论的支持者都认为不要对货币政策的收效过于乐观，因而也无需讨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① 本文是《我国货币政策体系与传导机制研究》项目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8JZD0015。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通过价格粘性模型等,深入分析货币政策的微观经济基础,并运用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等,论证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基本框架。但是,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界对产出(就业)、通胀以及汇率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的作用意见不一。直到近1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认可度才逐渐提高。根据纯粹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一国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是使通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之差最小;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则在通胀目标之外,加上产出缺口,货币政策既要使通胀率与其目标之差最小,也要使产出缺口与其目标之差最小,通常将通胀项前的权重设定得大于产出缺口项前的权重。在通胀目标制下,仅考虑通胀和产出缺口,其他经济变量(比如,汇率、资产价格、消费、贸易条件等)不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单列,货币政策对这些变量的反应仅限于这些变量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影响范围之内;如果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变量的变化没有影响到当前或未来的通胀和产出缺口,按照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则可以任其波动,货币政策不必做出反应。在货币政策实践中,英国、瑞典、新西兰等国家的货币当局已宣布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近年来,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论证作了进一步完善,分析脉络逐步清晰。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理论建立在对企业生产定价和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二是在论证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时,强调模型与数据的动态拟合效果。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自回归(VAR)分析表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名义总支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即使是在半年前已经被预期到的情况下,利率变化的影响仍会在未来持续几个季度。三是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内,将代表代理人(Representative Agent)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评判政策目标合理性的依据,使得代表代理人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目标函数,就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四是在推导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时对代表代理人效用函数进行恰当的二次化,即对代表代理人的效用函数进行二次逼近。这种近似方法与 Linear-Quadratic (LQ) 优化控制框架相一致,易于与文献中大量有关最优货币政策的研究进行比较。

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微观基础分析及其所涉及的经济关系

本文对上述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结构和模型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推导。采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假设,并选取与 Woodford (2003) 和 CGG (Clarida, Gali & Gertler, 2002) 不同的更具代表性的代表代理人效用函数,结论更有广泛意义。

(一) 模型分析

在两国经济模型中, 本国(H)和外国(F)的家庭数量分别为 $1 - \gamma$ 和 γ , 家庭用 z 代表, 两国的偏好和技术都相同, 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可交易所有必要的 Arrow-Debreu 证券。本国消费指数 C_t 包含国内产品消费 C_{Ht} 和国外产品消费 C_{Ft} , $C_t \equiv C_{Ht}^{1-\gamma} C_{Ft}^\gamma$ 。消费物价指数 $P_t = k^{-1} P_{Ht}^{1-\gamma} P_{Ft}^\gamma$, 其中 P_{Ht} 和 P_{Ft} 分别是国内和国外商品的本币价格, $k = (1 - \gamma)^{1-\gamma} \gamma^\gamma$ 。用 P_{Ht}^* 和 P_{Ft}^* 分别代表国内和国外商品的外币价格, 用 C_{Ht}^* 和 C_{Ft}^* 分别代表国内和国外商品的国外消费。商品的生产包括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个环节, 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分布在 $[0, 1]$ 之间, 用 j 表示, 即 $j \in [0, 1]$ 。按照 Dixit & Stiglitz (1977), 企业 j 的劳动投入是 $H(j)$ 与各家庭所提供的劳动 $H(z)$ 之间的关系是:

$$H_t(j) = \left(\frac{1}{1 - \gamma} \int_{z=0}^{1-\gamma} H_t(z)^{\frac{\theta-1}{\theta}} dz \right)^{\theta/(\theta-1)}$$

中间产品企业 j 产出是 $Y(j)$, 产出与投入之间的生产函数是:

$$Y_t(j) = A_t (H_t(j))^\alpha$$

最终商品生产企业采用 CES 技术, 生产所需的投入是分布于 $[0, 1]$ 的中间产品企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 产出是最终产品 Y , 投入产出之间的生产函数是:

$$Y_t = \left[\int_{j=0}^1 Y_t(j)^{\frac{\theta-1}{\theta}} dj \right]^{\theta/(\theta-1)}$$

代表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

$$E_t \left\{ \sum_{s=t}^{\infty} \beta^{s-t} [u(C_s; \xi_s) - \int_{j=0}^1 v(H_s(j); \eta_s) dj] \right\}$$

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收入约束条件为:

$$\begin{aligned} & \sum_{s=t}^{\infty} E_t Q_{t,s} [P_s C_s + \frac{i_s - i_s^m}{1 + i_s} M_s] \\ &= W_t + \sum_{s=t}^{\infty} E_t Q_{t,s} \left[\int_{j=0}^1 w_s(j) H_s(j) dj + \int_{j=0}^1 \Pi_s(j) dj - T_s \right] \end{aligned}$$

其中, $H_s(j)$ 是中间企业 j 的劳动投入, ξ_s 和 η_s 分别是对消费偏好和劳动付出偏好的随机干扰, M_s 是第 s 期末的货币持有量, W_s 是第 s 期初的金融资产持有量 (满足 No Ponzi Schemes 条件), $\int_{j=0}^1 w_s(j) H_s(j) dj$ 是第 s 期工资收入, $\int_{j=0}^1 \Pi_s(j) dj$ 是第 s 期利润分红收入, T_s 是第 s 期缴纳的税金, $P_s C_s$ 是第 s 期的实际消费与价格水平之乘积, $Q_{s,s+1}$ 是随机贴现因子。无风险利率 i_s 和持有货币的利率 i_s^m 满足无套利条件。由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一价定律、市场均衡条件和贸易条件的定义 $S_t = P_{Ft}/P_{Ht}$, 可推出 $C_t = P_{Ht} Y_t / P_t = k S_t^{1-\gamma} Y_t$ 。在相关均衡状态逼近展开后, 效用函数的形式变为:

$$U_t = -\frac{k\bar{Y}u_c}{2} \{(\sigma^{-1} + \omega)(\hat{Y}_t - \hat{Y}_t^n)^2 + (\theta^{-1} + \omega)\text{var}_j \hat{Y}_t(j)\} + t. i. p. + O(\|\hat{Y}, \xi, \eta\|^3) \quad (1)$$

其中, $\bar{Y}$ 由 $v_y(\bar{Y}; 0)/[u_c(k\bar{Y}; 0)k] = 1$ 决定,

$$\omega = \frac{\partial \log v_y}{\partial \log y} \Big|_{y=\bar{Y}, \eta=0}, \quad q_t = -\frac{v_{y\eta}\eta}{\bar{Y}v_{yy}} \Big|_{y=\bar{Y}, \eta=0},$$

$$\hat{Y}_t^n = \log(Y_t^n/\bar{Y}) = (g_t\sigma^{-1} + q_t\omega)/(\omega + \sigma^{-1}) - \gamma\hat{S}_t(1 - \sigma^{-1})/(\omega + \sigma^{-1}),$$

$$\hat{Y}_t = \log(Y_t/\bar{Y}), \quad \hat{S}_t = \log S_t.$$

由最终商品生产企业对中间商品 j 的需求关系得出以下关系:

$$\text{var}_j \hat{Y}_t(j) = \theta^2 \text{var}_j \log P_{H_t}(j) \equiv \theta^2 \Omega_{H_t} \quad (2)$$

推导 Phillips 曲线的企业粘性定价模型来自 Calvo(1983)。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每期一部分产品价格不变, 这部分产品的数量占产品总数的 $0 < \alpha < 1$; 另外一部分产品价格会被调整, 这部分产品的数量占产品总数的 $0 < 1 - \alpha < 1$ 。根据 Woodford(2003), 推导出价格方差与本国物价通胀率的关系:

$$\sum_{t=0}^{\infty} \beta^t \Omega_{H_t} = \frac{\alpha}{(1-\alpha)(1-\alpha\beta)} \sum_{t=0}^{\infty} \beta^t \pi_{H_t}^2 + t. i. p. + O(\|\Omega_{H_{t-1}}^{1/2}, \hat{Y}, \xi, \eta\|^3)$$

将上式代入(1), 效用函数与通胀率(本国商品价格变化率)和产出缺口的关系为:

$$\sum_{t=0}^{\infty} \beta^t U_t = -\Xi \sum_{t=0}^{\infty} \beta^t L_t + t. i. p. + O(\|\Omega_{H_{t-1}}^{1/2}, \hat{Y}, \xi, \eta\|^3)$$

其中, 货币政策的损失函数 L_t 为:

$$\pi_{H_t}^2 + (\kappa/\theta)(\hat{Y}_t - \hat{Y}_t^n)^2 \quad (3)$$

$$\kappa = (1-\alpha)(1-\alpha\beta)(\omega + \sigma^{-1})/[(1+\theta\omega)\alpha].$$

由此可见,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包括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化率和产出缺口两部分并分别赋予特定的权重, 这一目标与代表代理人效用最大化一致。

以上分析有两项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发现:

一是得出了产出缺口在企业边际成本之外与部门企业间资源配置扭曲之间的联系。产出缺口除了与企业边际成本有联系以外, 还与企业间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相关, 即:

$$\hat{Y}_t - \hat{Y}_t^n = \frac{E_j \log mc_t(j)}{\omega + \sigma^{-1}} + \frac{\omega(\theta-1)}{2(\omega + \sigma^{-1})\theta} \text{var}_j \hat{Y}_t(j) \quad (4)$$

产出缺口既包括了经济总量的内容, 也包括了经济结构的内容; 前者体现为等式(4)中的边际成本项, 后者表现为等式(4)中企业产出的方差项。

二是给出了贸易条件与本国产出之间的替代关系, 体现了国际经济竞

争中各国之间的利益对抗性对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条件集中体现了本国居民福利受国外因素的影响。贸易条件是国外产品的本币价格与国内产品的本币价格之比,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国外产品相对本国产品变贵了。关于贸易条件的结论来自(3),在其他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恶化相当于本国产出下降,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是:

$$d\hat{Y}_i = -\frac{(1-\sigma^{-1})\gamma}{\omega+\sigma^{-1}}d\hat{S}_i \quad (5)$$

(二)微观基础分析及其所涉及的经济关系

通过模型的推导,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消费总量和劳动总量与福利的关系。对福利影响最直接的总量是消费和劳动。我们发现,货币政策将产出缺口作为目标,缩小产出缺口实际上协调了消费和劳动的关系,由此增加福利。在本文特定的模型环境中,等式(4)将产出缺口分解,其中 $E_j \log mc_i(j)k$ 对应的企业的真实(real)边际成本;企业真实边际成本与劳动边际负效用绝对值和消费边际效用之比正相关。若产出缺口为零,企业的真实边际成本在福利最大化的均衡状态为1(其对数为零),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满足福利最大化的条件 $v_y = u_c k S^{-\gamma}$ 。这也许是静态经济中最重要的总量关系,这一最优化条件与价格机制(或者其他任何市场或非市场的激励机制)无关,直接从福利最大化得出。如果劳动总量和消费总量都不足,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大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小,真实边际成本低于1,增加劳动和消费导致福利提高。相反,如果劳动和消费都过度,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小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大,真实边际成本大于1,减少劳动和消费可以进一步改善福利。

第二,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与福利的关系。货币政策缩小产出缺口和通胀(本国商品价格变化率)缺口,实际上也是在调整企业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扭曲,由此增加福利。我们发现,通胀(本国商品价格变化率)(见等式(3))和产出缺口的一部分(见等式(4))都对应企业产出之间的方差 $\text{Var}_j \hat{Y}_i(j)$ 。在本文特定的模型环境中,企业的技术和面对的市场条件相同,在福利最大化状态下,企业的产出水平相等。由于企业价格调整存在粘性,不同的企业可能定价和产出水平不同,带来企业和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

第三,贸易条件与福利的关系。货币政策将产出缺口作为目标,协调消费和劳动的关系以增加福利,是在一定的贸易条件下进行的。在福利最大化状态下,产出缺口为零,企业的真实边际成本为1(其对数为零),贸易条件是福利最大化条件 $v_y = u_c k S^{-\gamma}$ 的一部分。外国商品价格上升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使本国企业边际成本上升,均衡产出和就业下降。我们发现,在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集中体现在贸易条件方面。在其他状况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恶化相当于本国产出下降,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的线性关系(见等式(5))。贸易条件恶化给本国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于本国产出一定程度的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反,本国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外国贸易条件改善,这相当于外国产出一定程度的增加对外国福利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第四,当期目标与未来目标的关系。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仅包含当期的目标,而且包含未来的目标,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在对当前目标和未来目标不断权衡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在宏观变量(通胀和产出缺口)层面,货币政策的选择既在当期通胀和当期产出缺口之间,又在当期通胀产出目标与未来通胀产出目标之间。短期的通胀和产出水平与中长期的通胀和产出水平相关;由于货币传导机制的时滞性,货币政策对短期和中长期通胀和产出目标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总量和结构性变量层面,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关注当前的总量失衡,需要兼顾中长期的结构平衡。

三、对近期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分析既要有微观理论基础,又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与上述微观基础分析相联系,我们提出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分析的独特性

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分析的独特性可从总量、结构、外部因素和动态性四个方面加以描述。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之下,这四个方面的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

总量方面: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短期内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总量方面的矛盾,迫切需要突破的是在总量方面面临的制约。短期内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当中直接反映经济总量与福利关系的目标更为重要。具体来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数量庞大(2008年城镇就业人员新增加1113万人),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2008年当年的经济增速为9.0%)。理论上讲,增加劳务和消费可以增加福利,劳动者劳务付出增加导致边际负效用上升,消费增加使边际效用下降,这些因素导致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但实际上,在劳动和消费之间有生产—交换—分配等环节。在金融危机以前,外需对我国经济十分重要,2003—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11%以上。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外需的迅速消退使依靠国外市场需求获得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难以持续。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依然是内需增加的主要支撑。2009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50710亿元,同比增长33.1%,比上年同期加快

5.9个百分点。在当前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现象突出的情况下，投资不谨慎可能会加重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我国经济能否在总量上发展得快一些，关键不是生产能力，主要是市场对最终产品的持续需求。突破了市场总规模方面的制约，我国经济就能在不过度依赖投资的情况下增长得快一些。

结构方面：我国经济当中的结构性问题虽已积累到难以被忽视的程度，但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短期内解决总量问题的迫切性更大，更何况结构性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总量问题带来的。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反映结构性问题与福利关系的目标权重可以小些。在我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某些产业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主要不是商业上的考虑，而是社会效益和就业方面的考虑。由于存在就业压力，不合理的产能暂时还难以全部淘汰。不改变我国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调整就难以完全按照商业化原则进行。在来自就业方面的持续压力之下，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外部因素方面：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平稳合理的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外部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商直接投资减少、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有所缓解，短期内未必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但是，贸易条件恶化的中长期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2003年以来，我国贸易条件整体趋于恶化，其中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逐步趋于平稳，但初级产品进口的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整体贸易条件的明显恶化。根据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2008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推动进口价格总指数上涨超过40%，对进口价格总指数上涨的贡献度大于70%。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我国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伴随而来的是企业生产和就业的规模受到限制。贸易条件恶化挤压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潜在空间，可以完全抵消甚至大于货币政策优化对社会福利的贡献。

动态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经济环境迅速向不利方向转变，而国内消费尚不足以成为内需增长的引擎。在短期反周期任务加重、政策实施的空间被挤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重心不得不向短期目标倾斜，同时兼顾中长期目标。具体说，一方面，尽可能采用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措施来解决短期问题，避免出台不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措施；另一方面，致力于中长期目标的各项政策须尽可能缓解短期面临的反周期任务，有利于提高短期政策的有效性。

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情况不同。在消费总量和劳动总量之间关系基本平衡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是短期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来自价格粘性的结构性问题。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